

# 我懷念的「鮑思高家庭協進會」的團體生活

## ——紀念梁銘勳神父逝世二十周年——

朱承先口述 王培明整理

在中國七十年代初期，那些與主耶穌一起背十字架受苦難的神長、教友們，已為主作証。為中國的教難付出了寶貴代價，梁銘勳神父關在安徽白湖農場服苦役，刑滿後釋放回家，在他心中想的是一心要拯救修會，另外有蔡石芳神父、陸達源神父、朱樹德神父等，都想拯救教會，尋找迷失的羊。我們知道神父們回來了，心中十分喜悅，希望從此中國苦難的教會有了曙光和希望。

我在回滬的一段日子裡，每天去看望神長們，特別是梁銘勳神父，他不但是上海慈佑會修會的院長，也是我先生朱承先的導師。梁神父還是我加入「鮑思高家庭」的介紹人，他幫我填表申請，送往香港「鮑思高家庭」組織審批。他知道我結婚時正值中國教難時期，沒有神父，也沒有領婚配聖事，他就為我倆補辦了婚配聖事，在天主面前為我們的婚姻做証。梁神父是一位有聖德，謙遜、溫和、善良的好神父。我們每次去看他時，神父總是很高興的伸出雙手迎接我們。他在百忙中抽空與我們談話，一坐就是半天，有時還留我們吃飯。梁神父領導著北京的母佑會，常有北方修女來找他，他要做的事太多了。神父還要承先找回過去修道院所有的會士，要像手足同胞一樣團結友愛，互勉互助。許多同學和神父來往還被監視不方便外出，朱承先就委托了上海的老同學去打聽消息，尋找線索，把會士們邀約出來，告訴他們這是院長的指示，因為我們住在外地不容易尋找到他們，就一個托一個地找，梁神父要朱承先與國外的同學和神長們也建立聯繫網並安排接見。

朱承先寫信聯絡和會見他們都非常謹慎。（後來由於我把這些資料文件，順手夾在聖經本裡，讓突如其來抄家的公安人員拿到証據，說他是「聯通外國」罪名，將他逮捕入獄，這是後話。）不久梁神父告訴我們，香港來了消息，神父介紹的所有「鮑思高家庭」會員都批准了，我們十分喜悅，因為我們都成了「鮑思高家庭」的一員。我們都盡心盡職，守好規矩。在上海的人每月都參加活動。我倆在外地，只有一年回去一次。記得常常有兩位院長神父來為鮑思高家庭團聚獻祭，還有香港的一些神父也會在春節回上海探望我們。在那個時代的彌撒聖祭、避靜與聚會，要比現在和平時期的教友聚會等活動更加珍惜，因為我們的心靈十分乾枯，基督的憐憫和來臨是萬分珍貴和喜悅，我們有耶穌就感覺「苦中有樂，樂在苦中」。

我們還組織過自行車代步去佘山朝聖，來回路上騎車五個多小時，我們組織八個人，其中只有我是女生。一路上兄長們都照顧我，我雖很努力，但常常落隊在最後一個。我們帶著乾糧和水，到達佘山先上中山朝拜聖母，唱聖歌，念玫瑰經，求聖母降福。然後我們上山感恩謝別聖母，席地而坐享用各種不同的食品。一組八人就像一家人。我們為這種苦中有樂感到無限喜悅和安慰，我們的心靈也得到洗滌和昇華。那時我們都很年輕，無忌地談論著每個人的過去和嚮往的未來，陶醉在喜樂的夢境中。時間像流水一去不回，我們隨著年

歲的增長，如今只能懷念和回憶我們曾經擁有的快樂時光。現在我們八個人中的四個已去見天主。

在解放前，上海慈幼會修會在梁銘勳神父和姚維禮神父的安排下，先將已發過初願的高班學生先轉入香港深造。他們就是現在的王建童神父，吳頌先神父（已故），金聰威神父（已故），梁鼎熟神父，張錦泉神父，陳日君主教等。他們出國後並不瞭解中國教難詳細情況，由於當時的船運有限，先送走一批學生，再回來接第二批小班學生時，正逢中國解放，形勢急轉惡化，中國與外界完全封鎖，也與香港斷了消息。院長即時把小班學生轉入北方，那時北方比上海安全一些。由北京方廷忠神父負責保護。後來北京也遭迫害，方廷忠神父被抓坐了三十年牢，關在青海農場監督勞動，在刑滿釋放出去，96歲高齡還在香港作福傳。梁院長和姚院長都被關在安慶白湖農場監督，勞動三十多年。管理和領導小班的俞石柱、林蔭年修士也一並被捕，後來關押在內蒙古和江西農場三十多年監督勞動。俞修士現已故，林修士現雖回上海，但現在還在受嚴厲的監視和控制——電話有監聽，出門要報告，來人要告知同意。許多同學都無法探望他，他也怕給他人帶了麻煩，非重要事宜甚少聯繫。

當年北京蒙難後，同學們仍回到上海慈幼會修道院，只能眼看修會被共產黨軍管會接管，所有教會的財物全被侵佔，由協進會劉多墨，副會長，學生會主席朱承德帶領大家保護修院，卻招到大批學生逮捕，關進看守所。後來有的被釋放，有的被發配送往江西、湖北、新疆等農場監督勞動，判十多年、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的都有。修院從此被迫解散。鮑斯高會學生雖然被解散，但他們常常到一位聖母軍貞女家裡集合，祈禱，開會，等待。貞女是朱承德、朱承先的姑母朱雅寶孃孃。兩年多後開始抓聖母軍，姑母是副會長也被逮捕。

後來雖然院長神父不在了，但是我們還是按照他的指示，「鮑思高家庭」的主內兄弟姐妹們還是常常團聚，一起祈禱，團結互助，相親相愛。我為此而開心和滿足。我在這世上有了兩個家庭，一個是小家，而另個是大家，而且有了許多的兄弟姐妹，我們互相關心，相親相愛。

院長指示我們大家要把失散的人找回來，像我們已婚的也吸收在鮑聖大家庭組織裡。特別是上海的一位貝雅馨同學主動負責聯絡找尋。經過三十多年，每位修會同學大部份都找到了。唯獨一位項培忠同學一點消息都沒有，直到五十年後，才打聽到他還在新疆農場受苦，同學們把他勸回來。他回來時兩手空空，父母都已亡故，兄長不敢接納他怕牽連全家安全，又無戶籍和居所，只有過去修會的同學，主內兄弟，大家知道後都伸出援手，出錢出力幫他度過難關，又幫他找了工作，這才能自食其力維持生計，可惜他已年老體衰，有病在身。同學再次集資帶他入院看病，勸他聽醫生話開刀治病，不用擔心費用問題。令人很感動。

貝雅馨同學遵照梁院長的指示，堅持找到最後一個修會兄弟，在不久前也離開人世了。我們也親眼目睹在鮑聖大家庭內尋找到每一位久別的兄弟是多麼高興喜悅。特別是貝雅馨同學，總是親手料理招待大家。深信在天的梁神父和姚神父也會感到安慰和喜慶的。我們現在來了美國能每一期看到鮑斯高家庭通訊。我們還是鮑斯高家庭的一員，關心著鮑斯高家庭年輕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生活和信仰的成長。當初我們在大陸加入鮑斯高家庭組織是秘密

活動，如今在美國都是公開的組織，真正的信仰自由之地。感謝天主降福我們下一代，求賜早日得到真正的信仰自由。

——寫於 2012 年 9 月 12 日 加州洛杉磯 蒙特利公園市——